

分类白话诗选

中国现代文学
作品原本选印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分类白话诗选

许德邻 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本书于1920年8月由上海崇文书局出版。此次按原版排印,对书中的错讹、脱漏等,参照原诗发表刊物作了校订。少数诗作因发表刊物难以查找,其作者无法考定,仍按原样标以刊物名或缺名。有些作品后来收入作家的单行本时,曾作过增删、改动,为保持原貌,本书一律不作更改。

分类白话诗选

Fenlei Baihuashi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6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4\frac{8}{4}$ 插页 8

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080

ISBN 7-02-000335-4/I·336

书号 10019·4264 定价 3.10 元

自序

“诗”，“古诗”，“近体诗”，“新诗”，这（诗学）的发达，要数我们中国顶早。诗的发源，原是古时的歌谣，散见在经书上的就是。这是人人都晓得的。不过在当时，还不能成一种独立的学科。自从《风雅颂》三百篇以后，诗的名义，完全成立了。但是三百篇诗的通例，虽然四言的居多，内中却有一言的，二言的，三言，五言，七言，八言的，并不是同后来的律诗一样，死盯着一种规格，就是谐声押韵，也并不拘定什么呆板的法律，不用韵的也很多。所以还算是自然的。“宋朝人硬定出一种叶韵的方法来，实是罪恶”。自从汉魏六朝，直到初唐，五言诗盛行，这算是改变了一种形式。然而从此以后，诗的束缚和矫揉造作的弊病，却一天深似一天，所以在我看起来，只好算是诗的退化。

隋唐以下的乐府和古体诗，比较汉魏六朝的四五言诗，解放了许多。构造也大半用白描的笔墨。自是诗史上的进化。可惜大多数的诗人，做乐府和古体诗的很少。就中最流行，最传染，流弊最深的诗体，就是律诗。律诗的平仄对偶，成了刻板的四方格子，谁也能一学就会。一班诗人，大约都在律诗上博他风雅的虚名，又用那些又冷又涩嚼不碎不消

化的典故做了对偶的资料，七拼八凑，似是而非，沓成了八句东西，教人看了越糊涂，他偏越说古雅典丽。我从前也在这个迷阵里转过几个圈子，后来自己觉悟了，很笑自己无谓。所以十年的光景，绝口不谈诗。有人问我，我便借了蒲留仙的一句滑稽话说：“从此不做诗，是藏拙之一道。”却想不到近来社会上的诗人，大文豪，却应运而生，竟多得“不可思议”。什么某某诗集，某某诗稿，某某诗余，也有登在报纸上的，也有私家专刻的，“光怪陆离”，闹得人家目迷五色。只可怜李玉溪的《无题诗》，被他们拿去做了幌子，王次回의《疑雨集》，竟造成了第十九重的地狱。无非是“粉香脂腻”“瘦绿肥红”一种肉麻讨人厌的声音，或者故意装出牢骚抑郁的样子，学那“三闾大夫的憔悴行吟”，或者钞些“梵语”“玄词”参些“野狐禅”，却自以为“亭亭物表，皎皎霞外”。又有几个老而不死无耻的词章家，戴着假面具，坐在高台上，壮他们的形势，把一种很优美的文艺，糟到极点。我平时看了，很盼望再出来一个秦始皇，狠狠的坑他们一下才好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我这种消极的思想，是毫无价值的。就是梁启超蒋观云那一班人，所说的诗学革命，也是有名无实的。我曾想把古代的歌谣，乐府，唐宋的小令，元曲，拣那白描的，纯洁的，集成一种书，做一个诗界革命的“楔子”。又苦于奔走四方，做那寄生虫的活计，不能偿我的志愿。到了前年，看见胡适君的提倡新诗，心里欢迎的了不得，我就东鳞西爪的，抄录了许多，觉得内中真有很高尚的理想和优美的感情，也够得上说有“弦外之音”。

近来做白话诗的人，一天多似一天，我抄录的白话诗，也一天多一天。在这个草创的时代，虽不能说（凡是白话诗）都是好的。然而比较那些虚伪的偶像和剪彩为花的推敲，总觉得有贤不肖之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旧诗的人，十九都有雕琢堆砌的毛病。高等的，挽了“拟古”的成见，把他自然的神韵和真实的意义都掩藏起来，只求合着古人的步趋和种种的假面目。所以，无论如何悲壮感慨，或豪华典丽，总觉得是做作，是“假的诗”，不是“真诗”。白话诗的好处，就是能扫除一切假做作，假面目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所以形式上的“美”，虽不能十分满足，但是纯任自然，总觉得是“真实的”，不是“假做作”的。这就是新诗与旧诗精神上的优劣。明理的人，自能领会，并非我一味偏袒白话诗哪。……

我们要研究白话诗，要先晓得白话诗的“原则”是“纯洁”的，不是“涂脂抹粉”，当作“玩意儿”的；是“真实”的，不是“虚”的；是“自然”的，不是“矫揉造作”的。有了这三种精神，然后有做白话诗的资格。有了三种精神，然后一切格律音韵的成例都可以打破。而且功夫既深，自有一种天然的神韵，天然的音节，合着人心的美感。比较那些死拘平仄，泥定韵脚的声音，总要高出万倍呢。所以，有人说新诗无韵如何算得是“韵文”，我说这个人不但不懂新诗，简直连古诗也不懂得罢。

白话诗的好处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各种。虽然是我个人的“一孔之见”，似乎“是非尚不大谬”，不过现在正在创造的

时代，总得要经过多数人的研究和多数精神的磨练，然后能够达到圆满的目的。要求经过多数的研究和磨练，第一步的办法须要把白话诗的声浪竭力的提高来，竭力的推广来，使多数人的脑筋里多有这一个问题，都有引起要研究白话诗的感想，然后，渐渐的有“推陈出新”的希望。这个就是我编这一部白话诗稿的本意。至于分门别类的编制，原不是我的初心，因为热心提倡新诗的诸君子，恰好有这一个模范。我就学着步武，表示我“同声相应”的“诚意”。我更盼望白话诗的成稿“与时俱增”，居然达到圆满的目的。那时我国的文学想想看已到了什么程度？……呀，岂不快乐……

民国九年六月杪 吴兴许德邻序

刘 半 农 序

我前面虽做了这篇序文，自己觉得学识很浅。对于诗学所以要革命的理由，说来不十分满意。想着《新青年》三卷五号上，有一篇刘半农先生的诗论，说的很透彻，很明白。虽然有些激烈的语气，但是对于现在的一班诗人，真是一种当头棒喝。所以把他载在下面，请大家看看。

许德邻

朱熹《诗传序》曰：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言。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。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，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曹文埴《香山诗选序》曰：“自知诗之根于性情，流于感触，而非可以牵强为者。而彼尚戈戈焉比拟于字句声调间也，则曷反之于作诗之初心。其亦有动焉否耶？”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有曰：“须知有性情，便有格律，格律不在性情外。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，谁为之格，谁为之律？而今之谈格调者，能出其范围否？”可见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，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，便算了事，便算极好。故曹文埴又说：“三百篇者，野老征夫游女怨妇之辞皆在焉。其悱恻而缠绵者，皆足以

感人心于千载之下。”可怜后来诗人，灵魂中本没有一个“真”字，又不能在自然界及社会现象中放些本领去探出一个“真”字来，却看得人家做诗，眼红手痒，也想勉强胡诌几句，自附风雅，于是真诗亡而假诗出现于世。（现在做假诗的，大约占百分之九十七八。我们如何可以不求革新呢？）

《国风》是中国最真的诗，——《变雅》亦可勉强算得，以其能为野老征夫游女怨妇写照，描摹得十分真切也。后来只有陶渊明，白香山二人可算真正诗家。以老陶能于自然界中见到真处，老白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，均有绝大本领，决非他人所及。然而三千篇“诗”，被孔丘删剩了三百十一篇，其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中，尽有绝妙的《国风》，这老头儿糊糊涂涂，用了那极不确当的“思无邪”的眼光，将他一概抹杀，简直是中国文学上最大的罪人了。（孔子删诗的疑问很多，现在也没有工夫说。但是“思无邪”三个字，说他极不确当，似乎太含混了，不可不辨。）

现在已成假诗世界。其专讲声调格律，拘执着几平几仄，方可成句，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，始得对得工巧的，这种人我实在没工夫同他说话。其能脱却这窠臼，而专在性情上用功夫的，也大都走错了路头。如明明是贪名爱利的荒伧，却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诗；明明是自己没基本领，却偏喜大发牢骚，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；明明是处于青年有为的地位，却偏喜写些颓唐老境；明明是感情淡薄，却偏喜做出许多极恳挚的“怀旧”或“送别”诗来；明明是欲障未曾打破，却喜在空阔幽渺之处立论，说上许多可解不解的话

儿，弄得诗不象诗，偈不象偈。诸如此类，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。自有这种虚伪文学，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，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来。至于王次回一派，说些肉麻淫艳的轻薄话，便老着脸儿自称为情诗；郑所南一派，死抱了那“但教大宋在，即是圣人生”的顽固念头，便摇头摆脑说是肝胆有骨气的爱国诗，亦是见理未真之故。“未尝谓中国无真正的情诗与爱国诗，语虽武断，却至少说中了一半”。近来易顺鼎樊增祥等人，拚命使着烂污笔墨，替刘喜奎，梅兰芳，王克琴等做斯文奴隶，尤属丧尽人格，半钱不值，而世人竟奉为一代诗宗。又康有为作“开岁忽六十”一诗，长至二百五十韵，自以为前无古人，报纸杂志转载极广。据我看来，即置字句之不通，押韵之牵强于不问，单就全诗命意而论，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，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，又如乡下大姑娘进了城，回家向大伯小叔摆阔。胡适之先生说，仿古文章，便做到极好，亦不过在古物院中添上几件“逼真贗鼎”。我说此等没价值诗，尚无进古物院资格，只合抛在垃圾桶里。痛快痛快。

我读了这一篇论诗的文，觉得有无限的感触，一时也不知从哪里说起。总而言之，要做诗，必须要有高尚真确的意想和优美纯洁的感情，才有做新诗的资格。愿同志努力。

许德邻

白话诗的研究

一 胡适先生提倡新诗缘起

白话诗的第一个发起人，就是胡适先生。他有一部诗稿，叫《尝试集》，就是他这几年来决心做白话诗的成绩。还有一篇序文，是他说明所以做白话诗的理由和经过的情形。我特意的把他载在下面，请诸君细细一看。一则可以理会得做新诗的旨趣，二则可以排泄种种怀疑的障碍物。是于白话诗的进行上，很有关系的。不过胡先生的原文很长，我只得择紧要的摘录下来，不但看了容易记忆，并且也可有些思考的脑力。（邻）

我现在自己作序，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。这一段故事，可以算是《尝试集》产生的历史，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。

我做白话文字，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。……到民国前二年，可算是一个时代。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。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（名《自胜生随笔》），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：

作诗必使老妪听解，固不可。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，亦何故耶？

东坡云“诗须有为而作”。元遗山云“纵横正有凌云笔，俯仰随人亦可怜”。

这两条上都有密圈，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。

又跋《自杀篇》一段云：吾近来作诗，颇有不依人徇径，亦不专学一家。命意固无从摹仿，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，盖颇能独立矣。

《答叔永书》一段：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，先从涤除“文胜”之弊入手。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，貌似之词耳。其中实无物可言。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，在于以文胜质。诗界革命，当从三事入手：一须言之有物，二须讲求文法，三当用“文之文字”时，不可故意避之。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。〔以质救文，是当今文化革新的唯一要义。也就是“自然”的第一步。（邻）〕

“诗之文字”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有许多人，只认风花雪月，蛾眉朱颜，银汉玉客等字是“诗之文字”，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。仔细分析起来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（意思是诗的精神，但是一班诗人哪里有真确的意思，简直是填砌杂凑罢了）。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，如白居易的《道州民》，如黄庭坚的《题莲华寺》，如杜甫的《自京赴奉先咏怀》。这类的诗，诗味在骨子里，在质不在文。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，决不能做这类诗。所以我的第一条条件便是“言之有物”。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“物”，所以用的文字，不问他是“诗的文字”，还是“文的文字”。

文学革命，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。即以韵文而论，三百

篇变而为骚，一大革命也。又变而为五言七言，二大革命也。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，古诗变而为律诗，三大革命也。诗之变而为词，四大革命也。词之变而为大曲，为剧本，五大革命也。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？……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。其时之词也，曲也，剧本也，小说也，皆第一流之文学，而皆以俚语为之。其时吾国，真可谓有一种“活文学”出现。倘此革命潮流……不遭明代八股之劫，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，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。而吾国之语言早成言文一致之语言，可无疑也。……惜乎五百余年来，半死之古文，半死之诗词，复夺此“活文学”之席，而“半死文学”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。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？

梅觔庄来信大骂我，他说：读大作如听莲花落，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。足下诚豪健哉！盖今之西洋诗界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，亦数见不鲜。……皆喜诡立名字，号召徒众，以眩骇世人之耳目……信尾又添两段说：文章体裁不同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，诗文则不可。今之欧美狂澜横流，所谓“新潮流”者，耳已闻之熟矣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吾国人也。

这封信颇使我很不服，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，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，和欧美文学的新潮流并没有关系。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，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“国语的文学”的历史。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，很象欧洲当日的情形，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，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，增添一点勇气。觔庄硬派一个“剽

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”的罪名，我如何能心服呢？

叔永来信说：……白话自有白话用处（如作小说演说等），然不能用之于诗。如凡白话皆可为诗，则吾国之京腔高调何一非诗？……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，即以诗论，其老者，如郑苏龠陈伯严辈，其人头脑已死，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。其幼者，如南社一流人，淫滥委琐，亦去文学千里而遥。……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，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，更无吾侪厕身之地。……唯以此（白话）作诗，仆则期期以为不可。……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，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腔高调，而陶谢李杜之流，将永不复见于神州，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？

我答叔永信中说：……白话入诗，古人用之者多矣。（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。）……总之，白话之能不能作诗，此一问题全在吾辈解决。解决之法，不在乞怜古人，谓古之所无，今必不可有。而在吾辈实地试验，一次“完全失败”，何妨再来？若一次失败，便“期期以为不可”，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？

答叔永信很长，我且再抄一段：

（1）文学革命的手段：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腔高调做诗……

（2）文学革命的目的：要令白话京腔高调之中，产出几许陶谢李杜。

（3）今日决用不着“陶谢李杜”的陶谢李杜。若陶谢李

杜生于今日，仍作当日陶谢李杜的诗，决不能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。何也？时代不同也。

（4）吾辈生于今日，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，两汉，六朝，八家文字，不如作家喻户晓的《水浒》《西游》文字。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，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。……吾志决矣，吾自此以后，不更作文言诗词。（这是胡适君第一次的决心。）

新文学之要点，约有八事：

（一）不用典（并非成语）。

（二）不用陈套语（并非成语、乃是从前通行的滥调）。

（三）不讲对仗。

（四）不避俗字俗语。

（五）须讲求文法。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。

（六）不作无病之呻吟。

（七）不摹仿古人，须语语有个我在。

（八）须言之有物。以上为精神（内容）的一方面。（参看

《新青年》第二卷五号《文学刍议》说的很详细）

我的《尝试集》……我初回国时，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“太文了”。美洲的朋友嫌“太俗”的诗，北京的朋友嫌太文，很觉奇怪。后来平心一想，这话真不错。……这些诗的大缺点，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。句法太整齐了，就不合语言的自然，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，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文法来迁就五七言诗的句法。音节一层，也受很大的影响：第一，整齐划一的音节，没有变化，实在无味；第二，没有

自然的音节，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。因此，我到北京以后，认定一个主义，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，……和白话的自然音节，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。这种主义，可叫做“诗体大解放”。……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，一切打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要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这样方才有真正的白话诗，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。《尝试集》第二集的诗，虽不能做到这个目的，但大致都朝着这个目的做去。

以上说《尝试集》发生的历史。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。我的第一个理由，是因为这一年来，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怀疑。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，简直持反对态度。因此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，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，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。第二，我研究白话诗已经三年了，我很想把这三年的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人，作为我的报告。……第三，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，我觉得……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，……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“实验精神”。……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，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。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，他也说：“呜呼适之，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，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，非特文言与白话之争而已。”……我们认定“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”，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，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。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，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。但是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

的可能，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。我们对于这种怀疑，这种反对，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，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。科学家遇着一种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，只可认做一个假设；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，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。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，因为未经大家承认，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。（现在承认白话诗的人不少了，做白话诗的人，也一天比一天多了，这试验的成绩，是很有希望的了。）

我们这三年来，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，——做五言诗，做七言诗，做严格的词，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，做有韵诗，做无韵诗，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，——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，要看白话诗是不是要比文言诗更好一点。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“实验精神”。……

二 新诗略谈

宗白华

我日前会着康白情君谈话，谈话的内容是“新诗问题”。因时间短促，没有做详细的讨论。但却引起了我许多对于新诗的感想，今天写出来请诸君的指教。

近来中国文艺界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，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。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？〔沫若君说真诗好诗是“写”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。这话自然不错。不过我想我们要达到“能写出”的境地，也还要经过